

蓟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蓟县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目 录

曲海扬波	魏喜奎 (1)
渔阳名宿金凤翥	金振东 (36)
仇锡廷先生事略	李长魁 (63)
忆梅师	王 敬 (65)
古稀忆往	刘智渠 (71)
在北国的日子里	王玉杰 (88)
被押往日本当劳工的经历	张文泉 (111)
战火中成长的滦西影社	王雪松 (123)
解放前的蓟县商会	马治山 周国泰 范连义 (134)
“大老西儿”经商的苦辣酸甜	周国泰 范连义 (142)
刺杀日本天皇特使事件	吴竹亭 (154)
忻口战役亲历记	韩开元 (164)
孙各庄满族乡	晏积智 吴竹亭 (169)
蓟县治蝗纪实	田广元 (183)

理教发源地岐山涧水洞	张希成 (202)
盘山名刹万松寺	孟宪华 (210)

清代唯一的皇太子园寝	徐广源 (219)
魏源与盘山	葛培林 (227)
渔阳、蓟、无终变迁考	吴殿聪 (235)

小资料

田畴小传	(110)
萧晶玉与《十粒金丹》	(209)
张朝琮小传	(52)
刘守荣小传	(201)
刘子琢小传	(226)
王崇实轶事一则	(168)
蓟县抗战前的皮影概况	(234)
三十年代独乐寺小学校歌	(35)

曲海扬波

魏喜奎

魏喜奎，原籍蓟县西桥头村。我国著名的曲艺曲剧艺术家，“北京曲剧”的主要创始人。现在是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北京曲艺曲剧团副团长。

第一回 降生唐山，爱皮影

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是演员，演戏的，戏里常有“树从根脚起，水打源处流”的词。回忆我的过去，写艺术回忆录，也得从根上来。

我原籍京东蓟县（现属天津市），祖居西桥头村。父亲魏永富，是说唱乐亭大鼓的艺人，曾经在北京，跟老一辈名艺人王祯禄先生学过，算是王门徒弟。父亲经常在码头说唱，由我爷爷给他弹弦伴奏，我哥哥魏宝华，我嫂子金兰英随同说唱。我母亲是外行，干的是伺候一家老小生活起居的事。

1925年，我父亲正在唐山卖艺，中秋节过后不久，母亲生下了我。唐山，是出产煤的地方，矿工很需要文化生活。那时没有别的文艺形式，矿工们工余之暇只是看看当地的皮影戏，

听听说唱的鼓曲。我父亲的生意很好，自从我降生，又在这里呆了有5个年头儿。

这5年里，我接触的都是皮影和我父亲唱的乐亭大鼓。也许是家庭影响的缘故，我从懂事起就爱唱爱表演。起先是听了我父亲唱的乐亭大鼓，就学着唱，稍长了一点，自己能到处去玩了，就跟着我们邻居的一个小姐姐去看皮影戏。对比我父亲唱的乐亭大鼓和皮影戏，我有了选择，我觉着皮影戏比乐亭大鼓好，皮影戏有唱，有表演，吸引人。乐亭大鼓拉长腔，唱得慢，尤其没有表情，我不大喜欢。可是我也觉着唱皮影戏的人，捏着嗓子唱，把嗓音憋得溜尖、挺细，没有我父亲唱的乐亭大鼓唱得自然。

每逢看过皮影，回到家里来，我都要把戏里的动作学给父、母亲看，也学着哼几句唱，但是我从不把声音憋细。我爷爷和我父、母亲看到我能唱能表演，满脸含笑，嘴里夸赞：“这丫头真机灵，多有玩艺儿！”我父亲的朋友则是说：“这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啊！”随之就跟我父、母亲说：“这丫头可是干这行的坯子，将来让她干这行准有奔头儿！”

别看我父、母亲夸我，可心眼里不想让我干这行。因为那个时候说书的、唱曲的、唱戏的，属于“下九流”，处在社会最底层，既让人看不起，又到处受欺侮。旧社会作艺的常说：“笤帚疙瘩戴帽子，都能欺侮咱们。”这句话的确是当时社会现象的极好写照，也是作艺人心理的极好描摹。在旧社会，说书唱曲，唱戏，这个行当有“不养小不养老”之说。岁数太小，人不起眼儿，艺不景人（艺术不高），挣不着钱；超过四十，奔五十，人老珠黄，模样差了，即使玩艺好（艺术高），也不易招徕观众，同样挣不着钱。年轻的姑娘挣钱容易，但是比小伙子受的

折磨还要多，所以我父、母亲决心不让我干这行，常是说：“等长大了，找个婆家，跟人家好好过日子去，比干这行强多了！”

我可是从心里喜欢干这行。不论是谁，每当问到我：“你想不想干这行啊？”我都是干脆地回答：“想干这行，不过我想唱皮影戏！”

在学唱皮影戏上，我和那个小姐姐的想法也不一样。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学唱的时候，无论她装男的，我装女的，还是她装女的，我装男的，我都不憋着嗓子发尖音。她却不同意，总是说：“你学人家唱，又不按照人家那么唱，这叫什么？”我就说：“我觉着那么唱不好听，我爸爸就不那么唱，咱们学，也可以改！”我常想：我长大了要是真唱皮影戏的话，我一定把唱法改了。

如果我们在唐山再多住上几年，我还真可能唱皮影戏去了。谁知我不该干皮影戏这行，该当曲艺演员。

唐山的矿工，原来挺富裕，在这儿卖艺的人也不多，所以跟我父亲一样，说书的、唱曲儿的、演戏的，营业都很好。这儿的营业好，传出去了，外边作艺的人纷纷往这里来。来的人越多，越显僧多粥少，营业逐渐不如以往。另一方面，矿主不断增加对矿工的剥削，要求干活的时间长，发给的工资少，矿工们减少了时间，钱就挣得更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听书的、听曲的、看戏的大为减少，迫使我父亲不得不离开唐山，另寻去处。

第二回 旅居营口，遇师叔

过去，东北地广人稀，日子似乎好过一些，所以河北、

山东的贫民多到东北去谋生，叫作“闯关东”。唐山离东北比较近，我们一家准备离开唐山，也就打定到东北去的主意。

那时候不可能认定一个目的地，直去直来，没那项路费，必得是一路往前走，一路说唱，遇到哪个地方听的人多，营业好，能挣到钱，就多呆几天，这叫作“且战且走”。这么样一步步地出了山海关，又这么样再往前走，来到了临近渤海边的城市——营口。这个地方是鱼虾集散市场，当地渔民生活很富裕，每当闲暇，都以听鼓书解闷儿。我父亲看出这能挣钱来，就打算在这儿呆下去。

如果是路过这儿，临时“撂地”（打地摊）说说书，呆上一两天就离开，一般地说来是没有人干涉的。如果打算长呆下去，就得跟当地的“地头蛇”说明，得到他们的许可。所谓“地头蛇”，一方面是管地皮的，土地把头；一方面是垄断当地卖艺的人，也是把头。土地把头要跟卖艺的按“二八”、“三七”，甚至“四六”分钱；垄断卖艺的人，也得收取一定的钱，轮到卖艺人这儿，已经被剥削去一大部分。我父亲由于才来乍到，只跟当地土地把头租了地盘儿，又在附近找了个小旅店住了下来。每天说书，都能招来大量的听主儿，挣得大把的票子，虽说被土地把头分去，也能够一家数口吃上饱饭。

不想由于没有马上去拜望当地垄断卖艺的人，没说几天书，就出了事。一天，我父亲说书，正说到热闹之处，听众里三层外三层围拢住，屏息静听，忽然从远处来了几个人，走到人群外边，高喊：“靠边儿，靠边儿，闪开点儿，闪开点儿！”随之就往人群里挤。听书的人让开了一条道儿，这几个人来到我父亲面前，那个打头儿的冲我父亲一伸手，说：“先别说了！我问问你，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懂得规矩不懂？”听书的人

意识到要出事儿，纷纷走散，只有一些好事的留下来看热闹。

我父亲心里明白，这是由于没有拜望当地卖艺的把头，这几天自己生意又挺好，招致人家不满，前来寻衅。“光棍不吃眼前亏”，赶紧上前递嘻和，说：“您几位多包涵，我一家逃荒到这儿，两手空空，我是打算先挣点钱，买点东西（礼品）再去登门拜望，您几位高高手，让我说下去，晚上一定去请安。”其中一位提高调门儿问到：“你是干这个的不是？道道‘蔓儿’吧！”

所谓“道蔓”，就是说说姓名。过去一师之徒，名字中间一个字都是相同的，听了姓名，就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师承，是哪个门的徒弟。我父亲赶紧说：“我叫魏永富。”听我父亲说出这三个字，那个打头的惊讶地自语：“是永字的？”紧接着问：“老师（师傅）是谁？”“王祯禄！”我父亲这三个字刚刚出口，那个打头的马上变了态度，凑近前来，仔细端详我父亲之后，说：“您是师哥！”跟着一安到地，喜形于色，说：“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啦，多有得罪，多有得罪！”我父亲赶忙还礼，问道：“恕我眼拙。您是……”

“我是周永福啊！”听他说出名字，我父亲也约略辨认出来。师兄弟抱头流泪，叙了几十年的别情，其他人也都变得和颜悦色，上前寒暄。

父亲把我拉过来，让我叫周永福师叔，叫其他几个人叔叔、大伯。

这位周师叔，把我们一家人让到他家里，盛情款待。看样子，周师叔家里也并不算富裕，可却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酒菜，包了饺子。周师叔住的房子也不很宽绰，却执意让我们都住在他家里，让把旅店房子退了。

晚饭后，两家人坐在一块儿叙家常，周师叔再一次夸我模样长得好，问我：“大侄女能唱几句了？”我虽然没有正经学过，但每天听也听会了一些，干脆地答道：“会唱。”“那就唱几句，让师叔听听，八成嗓子错不了！”师叔说了这话，我父亲拿手冲我一指，说：“那就唱几句。”我唱了几句，受到师叔和他家里人的夸奖，都说：“嘿，这孩子，嗓子真好，还挺有味儿的！”师叔紧跟着问我父亲：“师哥，大侄女模样好，嗓子好，干咱们这行有奔头儿，应当好好教她几段，再过几年，就能成您的好帮手！”父亲表示不愿意让我干这行，师叔不以为然地说：“有咱们哥们儿在前头，孩子受不了委屈，趁早让她学！”父亲说：“等我再想想……”话没说完，师叔就抢着说：“还想什么呀，您不教，打明儿个起，我教！”跟着问我：“怎么样，大侄女，学不学？”我见师叔那么热心，便不看父亲眼色，又干脆地说了个“学”字。师叔高兴地说：“好，打明儿起，咱们就奔这行！告诉你，好好学，往后有你吃香的、喝辣的时候！到那时候，别忘了你师叔就行！”

于是，从第二天起我就跟这位周师叔学起乐亭大鼓来。

有师叔的帮助，我们在营口这个地方呆了将近一年，过着不愁吃喝的日子。我学了好几段中、小型的“书”。正在这时候，有一个天津主顾来到营口，约师叔到天津去作艺。师叔觉得我们去天津合适，离我们老家近，就跟这位主顾说：“我师哥比我会得还多，说得也好，您看让他去怎么样？”得到人家同意，我们辞别了热情的师叔，离开营口。

第三回 首来天津，家遭难

由于清朝政府被迫和外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天津这个城市被外国瓜分，到处是外国的租界地。当地群众管被哪国“租借”去的地方，叫作哪国地，诸如日租界，叫作“日本地”，英租界，叫做“英国地”。凡是租界地，一概不准我们本国人进入，我们本国的普通老百姓只能在租界地以外的偏僻之处生活。当时天津的“闹市”，要属南市和谦德庄。我们从营口来到天津，就是在谦德庄一家书馆里营生，在书馆附近找了一个住处。

当时是1930年，我将近6岁，已经跟周师叔学会不少“书”。可是我父、母亲既不让到我到书馆去跟着说唱，也不许我到处去玩儿。每天把我带到书场，让我干的活儿是搬桌凳、扫场子、拿弦子、鼓；在我父亲说唱中间，略微休息的时候，拿上小笛箫，到听众中间去收书钱，名“打钱”。母亲甚至连书场都不让我去，打算让我上学念书，那时候满7岁才能上学，我的岁数不够，母亲就逼着我留在住处学做针线活儿。我不喜欢这个，安不下心来，不是把手扎了，就是把线缝错了，没办法，还得让我到书场去干零碎活儿。

母亲一心想着给我找个合适的人家嫁出去。按照当时社会习俗，女孩子都得扎耳朵跟儿、裹小脚儿，我不同意。当我睡着了的时候，母亲就偷偷给我扎耳朵眼儿。我疼醒了，又喊又叫，还是扎不成。母亲强迫用白布带子给我裹脚，我既怕疼，又不愿意把挺好的脚弄得变了形，同样又哭又闹。终于因为我态度坚决，父亲劝阻了母亲，母亲才算罢休。

我父亲在谦德庄一连说了几个月的书，上座一直挺好，一家人心里十分高兴，不断念周师叔的好处。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我母亲生下小妹妹之后，得了产后风，一病不起。母亲是家里的台柱子，平时做饭、洗衣裳，家务活儿全归她一个人。她这一病，家里外头的事全落在父亲的身上，不能耽误说书，回家来还得买东西、做饭、洗洗涮涮。母亲的病，也得由他照顾：请大夫、抓药、熬药，不一而足。母亲的病始终不见好，父亲累得骨瘦如柴，脸色灰黑，精神不振。说书时往往由于走神儿，把词儿忘了，幸好是半说半唱，有爷爷弹弦伴奏，可以遮掩过去。

几个月来，为了给母亲治病，把在营口攒下来的钱和在天津挣的钱，花得干干净净，还借了外债。可悲的是母亲终于离开了我们。筹办后事又要花一大笔钱，急得爷爷连连跺脚，说：“这让我儿子怎么办哪！”爷爷急火攻心，也一病不起；我那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妹妹，由于缺奶和得不到照顾，病得也很沉重。不久，这祖孙相继离开人世。父亲悲上加悲，愁上加愁，短短的几天，已是满头白发，脸上的皱纹明显地增多了。此时家无分文，幸亏跟我父亲一同说书的孙玉峰叔叔，在天津人熟，带着我到处给人家磕丧头，凑了一些埋葬费，总算把丧事草草地办了。

母亲去世，父亲缺少家里的帮手；爷爷去世，父亲失去伴奏的弦师。父亲知道我哥哥、嫂子是指望不上的，只好辞了谦德庄书场的事，让我哥哥、嫂子自寻出路，往别处谋生，带着我回到蓟县老家。

第四回 初回蓟县，苦练弦

我虽是蓟县人，但是自出生以来，六年多的时间里，都是跟随着父亲在外地客居。这次来到老家，在村庄上见到那么多同族人，觉得十分新鲜；受到长辈、同辈的热情相待，感到非常温暖。我想：如果跟母亲、爷爷一起回来，那该是多么高兴啊！

在同族人的开导、照顾下，父亲的精神，身体逐渐恢复。这时正赶上春暖花开，一年一度的盘山庙会就要到了。盘山庙会远近闻名，每逢庙会会期，香客、游人极多。父亲知道到那里说一期书，能挣回许多钱来，能够还帐，还有富余。就约了一位同族兄弟给他弹弦，带着我往盘山来了。

盘山离我们家百十里路，我们在村子里借了一辆独轮小推车，把演出用的布篷、弦子、鼓和行李放在上面，由我父亲和那位叔叔轮流推车、拉纤。我有时跟在地上走，有时坐在车上，也有时帮助拉纤。跟从唐山奔营口一样，路上随走随停下来说书，为的是多挣点钱。途中只要有集镇，能有说书挣钱的机会，父亲都不放过，能呆一两天就呆一两天。心想离庙会正日子还有些时间，不耽误事就成。

我们是庙会正日子的头天后晌赶到盘山庙会的，庙前的空场上早已搭起不少凉棚，卖茶水的都已垒起炉灶。我们找了一块地方，也支起了篷子，把行李和弦子、鼓安放好，准备好休息一宿，养精蓄锐，次日开张说书。我们睡觉前还是明月当头，满天星斗，没想到睡到半夜竟然下起瓢泼大雨来。我们一路辛苦，倒头酣睡，惊醒之时，雨水已漫地横流。帐篷上也不断往

下滴雨水。我们的被褥都已湿透，赶紧爬起来收拾一切，抢在怀里，奔向庙里避雨。那时不仅庙里的廊子下，连山门的门洞里都挤满了人。我们只好在边上挤着。雨暴风狂，我们的衣裳一会儿工夫就湿漉漉的了。在风雨中熬过后半夜，父亲打了个喷嚏，但见满脸煞白，又呕吐不止。

幸好天亮时雨住了。叔叔让我照看父亲，他拿了一只碗去找姜糖水，来到离庙不远的一户人家。这家只有老两口儿，听说这个情况，赶忙把我父亲背到他家里来，还帮助请来附近的一位大夫。大夫说我父亲积劳成疾，由外感发病，身子太虚，得好好补养，不是一两天能好的。两位好心的老人留我父亲在他们家养病，但是呆会儿庙会开始，怎样办？篋子支着，没有人吗，也得交地皮税。我们挣不来钱，反而要往外拿钱，非困在这儿不可。我就偷偷跟叔叔说：“您跟我爸爸说，让我替他唱吧，我能唱。”父亲还是一再摇头。我可急了，凑近父亲的脸说：“爸爸，我不唱咱们哪儿弄钱去呀！在这没亲没故，借钱都借不出来呀！”再加上叔叔和那两位老人都说：“要不就让孩子试试，能挣几个是几个。”叔叔说：“我弹弦保着她！”两位老人说：“我们在这住了几十年，方圆左右都是熟人，有我们在场，孩子唱好唱坏，没人起哄。”父亲心里清楚，除此别无他路，也就点了头。

在盘山庙会上，算是我演唱的开始。头一段，我唱的是《刘瑞莲借米》，只唱了开头几句，就得了一片喝采声。也许是因为大伙儿看着我岁数小，要求不高。我在庙会上连唱了4天，把跟周师叔学的中篇、短篇唱了个八九，还真挣回不少钱来。第5天，父亲能凑合着唱了，我们爷儿俩就倒换着说唱，总算把这期庙会唱下来了。

从盘山回到西桥头村，一则父亲真找不到帮手，没法干说书的营生，二则受各方面的掙掙，谁都说我非干这行不可，这才决心让我干这行。一天晚饭后，父亲问我：“丫头，你真愿意干这行？”我干脆地回答“愿意！”“要干这行就得干下去啦！”父亲看着我，等我回答。我又干脆地说：“就干这行！”父亲把我的手拉过来，用沉重的语气说：“你妈活着的时候，一直不打算让你干这行，爸爸也有这个想法，可到如今没辙了。人没人，钱没钱，爸爸愿意一个人苦奔苦跑，可找不到弹弦儿的。你既然愿意，爸爸就委屈你啦。要干，就得下狠心，下苦功夫。作艺的这行，要干就得干出个样儿来。丫头，从今儿个起，我可得折磨你啦，你可别说爸爸心狠，皆因不这么着练不出功夫来呀！”我立刻说：“不要紧，多苦我都不怕！”

弹弦比打竹板更难。我开始先练打竹板，以便先给父亲“贴板”（以打竹板伴奏），由他说竹板书。学打竹板，先得练腕子，腕子不灵活，板不听使唤。扬起板来再落下，不是打歪了，就是打横了，上下两块板总对不到一块儿。一天到晚拿着板打，腕子就肿了。咬着牙，忍着痛接着练。过了肿、痛关，腕子上就有劲儿了。板，扬起落下运用自如，两块板能周周正正地碰到一块。以后，再练打点儿。要打好点儿，还得过“一根筋”的关，也就是两只手上的板（一为板，一为节子板），总同时打一个点。必须做到左、右手打出来的点儿，穿插开来。我练了两个月，算是熟练了，能够为父亲“贴板”伴奏了。

接下来便开始练弦了。练弦子时，我体会到父亲对我的“折磨”。自从母亲去世以后，对我更为关心，更加疼爱的慈父，到教我练弦子的时候，立刻变了一副模样，成了冷酷无情

的严师。

练弦子，先在右手拇指和食指上绑上假指甲，拿起弦子来，得找准上、中、下把。弹弦子都是坐下来，把弦子立在腿上。我刚八岁，身量又矮，这么样就够不着上把了，只能把弦子立在地上，我蹲着找上、中、下把。先练“搓儿”，也就是只揉弦，不弹点儿，练两三个小时，手指酸疼无力，咬着牙支持下来。离开弦子的时候，手里得揉黄豆，练手指的活泛劲。

“搓儿”练得差不多了，开始练点。严冬，寒风刺骨，父亲让我在大风地里练，手冻紫、冻僵，也不准停下来暖和一下。我的手冻得生疼钻心，眼泪在眼圈里转，咬着牙弹。由于手僵了，点弹错了，音弹乱了，父亲毫不留情拿木棍、皮鞭抽打我的手。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豁出挨打，质问父亲：“这么冷的天，干嘛非在外边练？进屋去练不是一样吗？为什么这么折磨人哪！”父亲没有翻脸，却语气低沉地说：“爸爸疼你还疼不过来呢，怎么能白让你受折磨！现在不这么练，往后到冬天，赶上露天地里弹唱，怎么办？我这是为你以后真能干这行、干得好、能指着这个吃饭着想啊！”

弹弦，我是在痛苦中练出来的；喊嗓子、练唱，也是在严冬的风雪中，面对着风口练出来的。的确“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有了扎实的幼功，锻炼得不怕冷、不怕风的皮实劲儿，往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能坚持演唱。即使在数九寒天，风沙之中，照样上场。一张嘴沙子往嘴里灌，风噎得喘不过气儿来，演唱质量仍然不减。每当此时，我都想起幼年父亲严格督责我练功的情景，感谢他老人家对我的栽培。

第五回 再到天津，学评戏

我学会了弹弦，就给父亲伴奏，父亲重新以乐亭大鼓的形式在当地说“庄书”。“庄书”只能在农闲的时候，在村庄说，农忙以后就没人顾得上听了。正巧在这年农忙之时，我哥哥魏宝华、嫂子金兰英从外边回来。他们是在天津应了买卖，可是我嫂子因为染上抽大烟、吸白面的嗜好，不能坚持作艺，找我父亲去一同演唱的。我父亲知道他们久走江湖，染上了坏习惯，重财轻义，本不想和他们同去。一则他们一再哀求，二则农忙之后不能在当地活动了，就答应他们，再次来到天津。

这回是在南市的一家书馆里说唱。本来我们爷儿四个还是可以分两组的，只是我哥哥借口我的伴奏技巧比他差多了，不让我给父亲弹了，由他接过去。这样，他既可以多得一份钱，又可以让我给他们做饭、洗衣裳、伺候他们了。日子长了，我干的还不止做饭、洗衣裳的活儿，我嫂子吸毒越来越厉害，她说唱回来，躺在床上，我得蹲在地上给她烧烟泡儿，烧得老了、嫩了，腰、腿捶得轻了、重了，都会招她训斥，甚至毒打。我这时可真正受了折磨。

我不甘心这么下去，她们去了书馆，我就在家里练弹弦、喊嗓子，还偷着跑到书馆去。这些活动，如果让我哥哥得知，总要遭到打骂。有一回，哥哥打了我，把我从书馆轰出来。我哭着走到街上，碰见一位同行师叔，告诉我：“爱听唱，不用上你们书馆，我带你去‘燕乐升平’，那儿的什样杂耍花样多！”师叔把我带了去，跟把门收票的爷爷说，往后我来不要难为我，从此我便成了“燕乐升平”的常客。

“燕乐升平”，是比我父亲说书的书馆大许多的一个曲艺厅，每天演曲艺、演杂技。在这儿我特别爱听高五姑唱的天津时调，喜欢唱京韵大鼓的郑蝶影的漂亮劲儿。不想这两位演员不同的悲惨命运，都让我目睹了。

那时候演员没有生活保障，不能上台唱了，立刻就失去经济来源。高五姑就是因病，染上了吸毒嗜好的，久病不愈，把积蓄全用完了。从高级旅馆搬进小店，最后小店也住不起，终于流落街头乞讨，在一个天寒地冻的风雪之夜冻死街头。第二天被官方用席头一卷，埋在郊外，结束了一生。郑蝶影由于长得漂亮遭了灾。当地一个劣绅，垂涎她的美貌，借口请她吃饭，打算占有她。她知道此人不怀好意，几次拒绝了邀请，得罪了这个劣绅。一天她唱完了坐人力车回家，走在一个僻静之处，被一个不相识的人拦住，要求跟她说句话，她的车停下来，她刚往外一探头，那个人把一瓶凉水，泼在她脸上。她的脸烧得不成样子，眼睛也瞎了一只。连治伤带养病，也把积蓄花尽。虽然好了，再也无法上场演唱，只得嫁了一个比她大很多，长得又很不象样的人。

自从“燕乐升平”发生这两件让我痛心的事，我就不爱到那里去了。再经同行长辈携带，到演评戏的园子听“蹭儿”。由于我小时候就喜欢连演带唱的皮影戏，听了评戏立刻产生莫大兴趣。日久天长，南市一带的戏园子把门收票的都认识我了，我进哪家园子都没有人阻挡。我把那里的名角如鲜灵霞、刘翠霞、喜彩莲、筱俊亭的戏都看遍了，也学会了一些唱段和表演。经常遇上把门收票的爷爷、大伯，跟我开玩笑地说：

“姑娘，常来听戏，学会点儿没有？”我告诉他们：“会点儿，可唱不好！”“那就唱给我们听听，别尽白听戏不是。”